

古文獻研究叢書

宋代閩音考

刘晓南 著

岳麓书社

古文獻研究叢書

宋代閩音考

刘晓南 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夏剑钦

封面设计:胡颖

宋代闽音考

刘晓南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00

字数:250,000 印数:1—1,100

ISBN7-80520-950-2

G·124 定价:1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古文献研究丛书》总序

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世代相传的古籍必须持续地认真地进行整理、研究和传布的工作。不给这方面的工作以应有的位置,必然会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危害。如果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同样会造成危害,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当前古籍出版界有些情况,不能不让人担忧。为了逐利,有人抢着出版错误百出的标点本和今译;有人以对自己方便为原则,大量影印不好的版本,还吹嘘其如何名贵难得;有人滥印某些在今天已无推广价值,有的还对青少年身心有害的古代通俗小说,甚至还借鲁迅对这些书的评论来进行推销,实际上是把鲁迅从历史角度出发的评论歪曲为向现代读者的推荐。前不久还出现了把《孙子》八十二篇的拙劣的伪造本当作宝贝出版的怪事。在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学者中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人甘心给上面所说的那种出版商当下手。有人对某种古籍

并无真知,甚至连一般学者能读懂的地方也读不懂,却要加以整理研究。有人在研究古籍的著作里,用“六经注我”的办法,任情发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这些不正之风如不及时抵制,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蒋冀骋先生来信告诉我,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了建设古文献专业,决定投入一定财力编印一套古文献研究丛书。作者是本院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所一些学有专长的青年教师和造诣很高的资深教授。丛书的特点“重考据,不尚空谈”。内容有《诗经》、《庄子》和唐诗等的研究,佛经和其它古文献的语辞的考释,以及韵书的校释等等。岳麓书社已经答应出版这套丛书。我敬佩湖南师大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仁,能抵制当前的不正之风,下决心编写这样一套“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丛书;也敬佩岳麓书社能不顾经济亏损,答应出版这套丛书。衷心祝愿他们写好、编好、出好这套丛书。

裘锡圭

1996.12.14

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代序)

鲁国尧

我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初稿、二稿……直至现在的定稿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因为这个缘分,晓南同志要我作序,忝在知交,义不容辞。正好今秋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文系邀我作短期学术访问、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也发来 E-mail,要我去作一次关于传统音韵学方法的演讲,东北大学的花登正宏教授也邀我去与仙台的汉语学者交流。因此这两个月一边在读晓南同志的书稿,酝酿写序的事;一边在思索如何向花登、平田教授交答卷,两股线自然拧成一根绳,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话说,就“合二而一”了。

现将我 1998 年 11 月 6 日、11 月 17 日在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的所谓“讲演”写成文字,以序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

我谈的题目是“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这里先得交代一下,“研究”的对象是限定好了,而不是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加个状语“主要”是有意为之,文中会谈到。

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自然不止一种,可以从现代亲属方言或亲属语言运用历史比较法,上溯其源;可以从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接触来研究相互间的影响;可以根据理论演绎推阐;可以从传世的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用考古新获得的文献来印证……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殊途同归”,要是用西谚“条条大道通罗马”,似乎更形象些。方法是无所谓高下、新

旧之分的,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了格言,在这里我仿造一句,“实践是检验方法的唯一标准”,用某种方法能出结实的成果,这方法就是好方法。但是如果“成果”像青霉素,瓶子上印着“有效期×月×日止”,那就令人失望了。

现在着重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

我以为这种方法有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冷。如今通行讲层次,我就按层次讲吧。近十几年中国大学的校长多是理科专家,于是在文科中“重理轻文”的怨声四起。可是到了中国语言学系,掌权者多是或全是文学教授。而在“语言”层次里,现代汉语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则相对热得多,音韵学注定是冷门。在音韵学中,比起其他方法来,“从文献来研究”的方法就不那么新潮了,冷中之冷,真是到了冰箱中了。

何以处之?只有二途,一是趋利避害,趋热避冷;一是认了,“板凳甘坐十年冷”。“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这九百年前的诗句可真嘲笑了当今的一小撮书生。

特点之二是难。难有四。

首先是读文献难。且不论“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就是明清笔记,对今人来说,也不全是好懂的,北京、上海两地出版了好些当代专家整理过的新校点本,可是我们在古籍整理刊物上不是常常看到对它们纠谬的文章吗?谁都得承认:当今中国的作家、学者、政治家、公务员的语文水平整体滑坡,读古书的能力亦然,汉语史专家也不例外。

其次,寻找文献资料难。我们东方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上千年的绵长不断的文献纪录,中国人

喜欢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古书之多。在这么多的文献中搜集专题研究所需的资料,谈何易?“沙里淘金”、“大海捞针”并不是夸张的语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很多书生的亲身经历。

第三,与其他学科会通难。如果就熟知的韵书、字书、韵图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当然会有收获。如果我们想扩展,想开拓新的领域,搜集材料的范围就得扩大,就需要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根底,就要深入到戏剧学、诗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考古学、科学技术等等学科领域,在那些学科里寻觅与汉语史有关的资料,区分年代,辨别真伪,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四,立说难。一个人只要不是伪学者,著书的目的总是为了能立说,说能立。众所周知,有些别的学科立说不难,因为其说难以验证,甚至无法验证,读者不肯信其是,亦难以辨其非。可是从文献研究,立说特难,为何?因为著者读过的书,读者也多能读到,除非在日本的古寺里发现秘本、孤本。而严酷的事实是,读者读的书往往比著者多,因此著者辛辛苦苦所立之说不免被攻破,这就是说,从文献研究而得的结论很容易被检验,很容易被看出罅漏,甚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古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在文献之海里“探骊”而又要“得珠”,难,难,难。

就说这四点吧,其实还有第五难,就是赚稿费难。才华横溢的高手,振笔疾书,滔滔不绝,书厚盈寸。而从文献研究,一年半载方得一文,数千字而已。不过能坐冷板凳的多安贫乐道,故第五难不与焉。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特点之三是笨。读千卷万卷

书,抄千张万张卡片,做数不尽的统计,这方法难道不笨吗?看晓南的这本书,他从上万首(篇)的诗文里爬罗剔抉,竟然搜出反映宋代闽音的确切信息六百余条,不下死功夫,不用笨办法,能行吗?我常打这样的比喻:有些文章,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有如写意画;而从文献来研究汉语语音史,则如工笔画,孔雀的一根翎羽,要耗多少时辰啊!

特点之四是实。中国民间有句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甘坐冷板凳,迎着困难上,按照笨办法做去,总能结实(jiē shí 读阳平)的,这“实”是结实(jiē shí 轻声)的,实在的,不会像有效期短暂的青霉素,不会像炫耀着幻彩的肥皂泡。它没有轰动效应,但是可保“平实”。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在中国、在日本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我想这与环境、条件、传统、师承、爱好等等都不无关系。试想,某个地区,文献资料少,那怎能从文献入手来研究呢?汉语中有个四字格“扬长避短”,近二十年可谓家喻户晓,“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扬长避短”则是人类理性的升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专家可以夸口:我们拥有祖先传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我们的历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的辨伪、辑集、校勘、注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中日学者具有较强的阅读、搜集、研究古书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长处,我们应该“扬长”!

完全可以说,从文献研究,是语音史研究的基石。在深厚牢固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筑高楼大厦,反之则否,这是常识,毋庸多言。

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一

文出,《切韵》的长安音系说即告歇息。索绪尔在 1878 年提出的关于原始印欧语元音的假说在希太特铭文(按,也是一种文献)发现后得到证实。由于有了宋代福建文士的大量诗、词、文用韵的研究,闽方言史才得以以上推到 10-13 世纪。……伟哉文献之功!

浩如烟海的典籍(包括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的古代学者,我们的师辈远远没有开采完。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王念孙、王闿运都说过非汉唐之书不敢观的话。他们看过的书,我们要重看;他们没看过的书太多了,我们更要看。我们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觅搜新的研究材料,使用新的研究手段,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若问什么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近在眼前,这宋代闽音史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注重“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是不是守旧,或者复旧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初的学术史吧,那时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很激烈,一方面是饱读诗书的旧派学者,一方面是接受西学熏陶的新派学者,我们可曾注意到,赵荫棠氏的《等韵源流》之末有“旧声韵学家”“新声韵学家”的提法,而且列有名单。而在现在的音韵学教科书和论著中却看不到“新”“旧”这样的形容词,原因何在?本世纪下半期“新音韵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一统天下。现在还在从事音韵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全是“新音韵学”派的传人。这二十年出版了十几种音韵学概论的书,都跟旧式的音韵学入门书迥不相同,便可证明。

再说,我们主张“主要从文献研究”,绝非“唯一从文献研究”(按,即使是“唯一从文献研究”,只要出结实的成果,也是应该称道的),我们也提倡研究方言和方言史,试看今日活跃在学坛上的音韵学家,很多都同时从事共时方言和历时方言的研究,请注意,这可不是传统的方言语汇的溯古考释,而是运用“新方言学”

的方法和手段。我们比以共时描写为主要园地的新方言学更注意方言史的开拓,比如以两宋福建路文士的诗、词、文等大宗文献为资料,寻求其用韵的特点,就使方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说是重大突破,毫不过分。可以说,研究方言史,主要依据文献;要精确地断代,更非得依靠文献,舍此别无他路。我们还应该学习音系学和语言声学,关心国内外对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研究,注意历史语言学的新进展,……对于各种新说辨别、扬弃,以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要密切注意考古学、分子遗传学的最新动态。据报载,中国三峡地区发现了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的化石;安徽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进行的古人类化石探寻工作,有可能把亚洲古人类生活的年代向前推到二百万至二百四十万年前;中国南北二十八个人群的DNA的研究可以显示中国人种的来源,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与汉语的起源、分化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学者不可能死守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在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学者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

方法多种多样,每个学者各有其长。当然,最理想的是“全能”,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每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诸种方法都运用自如,然而这是可望而难即的。纵观以《马氏文通》问世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时期的一百年内,“样样都拿得起”(按,这是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1991年3月16日给我的信中的用语)的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可以各有侧重,也势必有所偏重,使用各种方法的学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个我们所向往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那是皆大欢喜的。

最后,我们特别要说的是,时至今日,“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尤其应该受到重视。本世纪初年,新学冲击了旧学,应该承认,这些新派学者的国学根柢也很深,如今这些学者都已凋零。一段时间传统文化跌入低谷,“束书不观,游谈无

根”，当今名学者、名作家文理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文化到了亟须维护、继承之时。说到这里，我要“节外生枝”：五十年代初中国到处有城墙，不几年间拆毁殆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连北京古城墙也不能免于难，终于在梁思成的哭声中被拆了，曾几何时，今日欲求古城墙而不可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该是重视文献研究的时候了。充栋汗牛的传世典籍，不断发现的考古文献，都是我们的金饭碗，祖宗留下了偌大基业，子孙的责任不仅在继承，而且要发扬光大。

我们要“扬长”，可是我们绝不能“避短”，我们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别的方法长处很多很多，是我们学也学不尽的。因为命题关系，我的答卷就只能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不敢离题。妄论之处，敬请仙台、京都的学者及海内外同道指正。

汉语有个成语，叫“因缘际会”，我发这番议论的际会是平田、花登二教授的试题，而因缘则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读文学作品的文章，知道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多有“原型”，那么我上述的想法的“原型”就是晓南同志的著作。

对于晓南同志的书的评价，我不再饶舌了，“尽在不言中”。

不过，还是不能已于言：今年五月上旬，我参加了北大期颐之寿的庆典，庆典之一是母校举办了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在会上见到了著名的文献学家孙钦善学长，我问他：“《全宋诗》北宋部分 25 册都出了，下面还有多少本？”“南宋部分 70 册，补遗 5 册都已交稿了。”我希望数年之后，《全宋诗》百册，还有《全宋文》若干册都出齐后，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增补本即定本也接踵而至人间，晓南同志能做到吧。

目 录

总序	裘锡圭 1
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代序)	鲁国尧 3
前篇	1
第一章 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实际语音	1
一、宋代文士用韵与礼韵部	2
二、宋人用韵与宋代实际语音	8
三、宋代福建文士用韵与闽音研究	13
第二章 宋代福建文士的年里与韵文作品	18
一、古闽地的历史沿革与宋代的文化繁荣	18
二、宋代闽音研究的资料来源及相关问题	21
三、宋代福建文士年里与诗词文作品	25
四、文字校勘问题	33
第三章 宋代福建文士用韵体例与诗文韵字判断	40
一、文章体式对押韵的要求	40
二、宋代福建文士诗文常见押韵句式	42
三、一些特殊的用韵现象	49

四、类推法	52
上篇	54
第一章 宋代福建文士用韵的实际韵部系统	54
一、果摄——歌戈部	55
二、假摄——麻车部	56
三、遇摄——鱼模部	57
四、止摄(含蟹摄三、四等)——支微部	58
五、蟹摄(一、二等)——皆来部	64
六、效摄——萧豪部	66
七、流摄——尤侯部	68
八、咸摄舒声——监廉部	69
九、深摄舒声——侵寻部	71
十、山摄、臻摄舒声——寒先部、真文部	71
十一、梗摄、曾摄舒声——庚青部	82
十二、宕摄、江摄舒声——江阳部	85
十三、通摄舒声——东钟部	86
十四、通摄入声——屋烛部	87
十五、宕摄、江摄入声——药铎部	88
十六、山臻咸深梗曾六摄入声—— 月帖部、质緝部	89
第二章 出韵与通语音变现象	97
一、佳韵系与夬韵的语音分化	97
二、灰韵系泰韵合口字向支微部演化	100
三、尤侯部部分唇音字押鱼模	112
四、庚青部部分牙喉合口唇音开口字转入东钟部	120

五、入声德韵部分字又押屋烛部	122
六、仿古及其他	124
第三章 声调的讨论	134
一、实际押韵中声调的组合及分布情况	134
二、上去通押与浊上归去	136
三、入声韵尾的变化与阴入通押	141
第四章 字音讨论	149
一、歌戈部	149
二、麻车部	151
三、支微部	153
四、皆来部	154
五、萧豪部	155
六、尤侯部	156
七、真文部	158
八、寒先部	159
九、江阳部	162
十、庚青部	162
十一、东钟部	163
十二、药铎部	164
十三、月帖部	164
十四、质缉部	165
下篇	166
第一章 宋代福建文士用韵的闽方音特点	168
一、歌豪通押	168
二、歌鱼通押	173

三、萧尤通押	176
四、支鱼通押	179
五、鱼尤通押	183
六、东阳通押	186
七、屋铎通押	189
八、阳声韵尾的合并	190
九、阳平声的分化	197
十、其他	203
第二章 闽语的历史渊源以及与周边方言	
的渗透与交融	211
一、前《切韵》现象	211
二、周边方言的影响与交融	215
第三章 一字多押与文白异读、训读、俗读	227
一、一字多押所反映的语音现象	227
二、文白异读	229
三、训读俗读	232
第四章 宋代闽方音特点的地域分布与闽语	
次方言的分野	235
一、宋代闽方音特点的不均衡分布	235
二、宋代闽语次方言的分野	238
附录一 闽方音韵谱	241
附录二 有关唐宋闽音韵部研究材料	281
附录三 宋代闽方言声母材料	295
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3

前 篇

第一章 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实际语音

宋代闽音是指约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时期福建一带地区的汉语实际语音。有关这个时期的闽音并无文献系统记录,没有直接的语言材料可供利用。然而作为一种间接材料,闽地文士的诗词文用韵材料却非常丰富,我们主要从闽籍文士诗词文用韵材料入手来进行这项工作。从诗文用韵中考求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是汉语语音史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从清儒以至民国诸家,考求先秦汉魏语音常循此法,其余波下及于隋唐。本世纪初,随着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语音价值被认识,北音的研究蓬勃兴起。但早期语音史家“在论述语音发展过程时,从《诗经》音至《切韵》音,再从《切韵》音至《中原音韵》基本上是跳跃式的。实际上《切韵》成书于公元 601 年,《中原音韵》序作于 1324 年,相隔七百余载。”^①处于这七百余载的后三百年的宋代,上承隋唐,下启元明,尤为重要,其实际语音亟待研究,其浩繁的诗词文用韵材料亦亟待开发利用。然而遗憾的是,直至本世纪四

① 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1979 年 2 期,页 104。